

URI :http://www.cnki.net/kcms/detail/65.1210.C.20161019.0104.006.html

【“新世纪散文家”专题研究】(主持人:黎保荣)

DOI:10.13880/j.cnki.cn65-1210/c.20161019.003

主持语:中国新世纪散文家,是指1990年代末以来成名的散文家,也指1990年代末以来依旧坚持创作的老散文家,例如余秋雨、贾平凹、史铁生、刘亮程、熊育群、王兆胜、韩少功、鄢烈山、周涛、张抗抗乃至杨绛等等。而新世纪散文家研究,不仅研究散文家的散文作品,也研究散文家的散文理论或散文观念。本刊拟将“新世纪散文家研究”作为不定期专栏,邀请相关专家、学者撰稿。此期先以既写散文,又研究散文理论的散文家王兆胜开篇,慢慢深挖,逐渐扩大,为新世纪散文家研究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王兆胜散文创作中的“女性形象”及“地母意识”

王 烨 吴 尧

(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)

[摘 要]王兆胜散文中的女性叙事,都把女性想象成为无私奉献的地母形象,视女性的“柔性”为天地间最有力量的主宰者,呈现出鲜明的女性崇拜倾向。从女性叙事的话语谱系角度看,王兆胜的女性话语属于“劳动妇女”和传统“道家文化”的范畴,与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话语保持着距离及张力。王兆胜的这些女性话语虽看似有些保守、落伍,但旨在驱使女性解放运动走向健全、正确的历史道路。

[关键词]女性形象;地母意识;女性崇拜

[中图分类号]I207.6

[文章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671-0304(2016)05-0030-06

“Female Image” and “Consciousness of Land Mother” in WANG Zhaosheng’s Prose Creation

WANG Ye, WU Yao

(Chinese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, Xiamen 361005, Fujian, China)

Abstract: Female narration in WANG Zhaosheng’s proses reckons women as the images of selfless land mother, and regards female “flexibility” as the most powerful dominator in the world, which shows a distinct trend of female worship.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narrative, female discourses in WANG’s proses fall in the category of “workwoman” and traditional “Taoist culture”, which has a distance and tension from contemporary radical feminist discourses. These discourses may seem to be a bit conservative and orthodox, but they aim at propelling a correct and full-fledged path for female movement for liberation.

Keywords: female images; consciousness of land mother; female worship

王兆胜是林语堂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专家。在学术研究和作品之余,他也热爱散文写作并笔耕不辍,2006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天地人心》散文集,就精选了他多年来散文创作中的诸多佳作。纵观王兆胜的散文写作,他在人生观、文化

观及散文写作等方面,都深受现代“性灵小品文”倡导者林语堂的影响,在当下中国城市化、现代化日益增速的社会处境中,坚守“自然”“和谐”的文化观念和“半半哲学”的人生态度,既有针砭时弊之意又有超脱的文化追求。他的这种崇尚虽难阻止

[收稿日期]2016-04-20

[网络出版时间]2016-10-19 1:04

[作者简介]王烨,男,安徽濉溪人,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20世纪革命文学思潮研究;吴尧,女,满族,内蒙古呼和浩特人,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,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。

及扭转城市化、现代化的历史步伐,但其“至诚”之声和“恪守”的姿态却令人肃然起敬,也使其散文格调走出“日常化”的体验而进入思想的澄明境界。读罢他的《天地人心》这部散文集,不禁令人脑海常常浮现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,觉得他们都是在社会蜕变中沉静独思天地之道和人生之本。

王兆胜《天地人心》这部散文集,也有不少回忆自我人生历程和家庭生活的“写实性”作品。他们或叙述一个乡村少年“成长”的艰辛及坚韧,或叙述自己家庭生活的困苦及温暖,或叙述亲人、好友亡故的不幸及悲楚。这些回忆性散文作品,既呈现出作者的赤诚之心,也将自我的人生磨砺和农村人的生存挣扎真切地呈现出来,令有同样人生经历的人们仿佛看见自我的身影。其中,《母亲的光辉》《与姐姐永别》尤其引人注目,不断被各种散文选本选录。这两篇以农村女性为题材的作品,都叙述了母亲、大姐两位亲人的艰辛人生,再现了当代乡村女性身上深蕴的优秀品德,呈现出作者心底深蕴的浓厚“地母意识”。本文主要根据这两篇作品,结合王兆胜其他关于“女性”的散文写作,探讨他的女性观念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意义。

一、王兆胜散文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性的“光辉”

王兆胜是在乡村长大而后到城市工作、生活的“农村人”。他的童年及少年时代都是在山东蓬莱农村度过的,“父亲是地地道道摆弄土坷垃的农民,母亲是地地道道养猪喂羊的农妇”^[1]。像众多生于1960年代的乡村青年一样,他经历了中国农村生活最为困难、艰苦的历史阶段,亲历了“恢复高考”后农村青年借助“高考”挣脱乡村的人生拼搏。这种“双重”经历既让他深识农村生活的艰辛,又让他感念家人及故土对自己的恩泽。因为如果没有家庭及亲友、师长的厚爱和鼎力相助,他无法实现“上大学”的人生之梦,也无法离开乡土而走进城市,成为“公家人”。随着那段艰苦岁月的远去和自己人生的成熟,随着那些抚育、帮助过自己的亲人先后病故,他心底深埋的感念之情再难抑制,《母亲的光辉》《与姐姐永别》这两篇散文就是在此情境中写出的。他们都再现了乡村女性养育子女的艰辛人生,揭示出乡村女性身上历代不泯的母性光辉及其勤俭、刚健、聪慧等优秀品性。

《母亲的光辉》原载2006年《黄河文学》杂志第6期,发表后不久后就被《散文(海外版)》转载。在这篇散文中,作者以“至情”之笔简洁描绘出母亲“美丽”而短暂的一生,以及她留给自己“模糊而又神圣”的印象。这篇散文开始就写到,母亲有个好听又美丽的名字“赵美云”,这个名字意境“悠远绵长”就似“栖息在蓝天之上的一朵美丽的彩云”,但艰苦的乡村生活过早地夺去她的生命,年仅49岁就撒手人寰,留下的仅是“辽阔、寂寞而又空洞的万里晴空”。熟悉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们都知道,由于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的弊端,由于经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农村生活的波及,以及国家实施“多生”人口政策的影响,中国农村经济在1970年代几乎走向崩溃,农村人的生活陷入极端的贫苦状态。对于这一时期的农村妇女而言,她们不仅要像男人一样参加集体生产“挣工分”,而且要操持全家众多人口的“衣食”,里里外外的忙碌使她们一年难得几日的清闲,这些都暗中消耗及损伤着她们的身体。就像文中所述,面对家中六个“嗷嗷”待哺的孩子,母亲几乎不能像别人家的母亲那样在家闲呆几天,有时忙得顾不上吃饭就“随手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拿块地瓜一边走一边吃”,有时夜至静深还在如豆的油灯下缝补衣裳或做花边手艺。这段简短平常的描述,不仅再现出母亲“壮年”时候肩负的生活艰难,而且反映出那个年代乡村妇女普遍的生存状态。正是这份生活劳碌拖垮了作者母亲的身体,使她刚进入中年就患上疾病并于六年后病故,留下四个尚未成人、尚待哺育的孩子。这篇散文虽未叙述母亲患病的过程及病情,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,夺去她“美丽”生命的就是生计的艰难和过度的劳累。正如作者所说,生于富户的母亲自嫁入寒门以后,恐怕就很少吃到一顿像样的饭菜,而她仅能用心当灯捻、靠点燃自己的心血养活一家人。

回顾母亲生前的艰辛人生时,王兆胜无意批判那“荒唐年代”带给农村人的生存重负,也不想过多倾诉母亲生前遭受的贫苦,而是想述说母亲及她那一代乡村妇女身上动人的品德“光辉”,以及这种美好的生命品质对自己心灵的熏染。母亲不仅长相美而且心灵美、品性美,属于“心灵纯洁、意志坚定、吃苦耐劳、情深意长、明理慧心和富有英气的那一类女性”。他坦诚、深情地写道,“今天,我

敬重、佩服甚至崇拜女性,对人生充满积极、快乐和美好的向往,与母亲直接相关”。作者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母亲一生的“勤劳俭朴”。她生于富户而选择嫁入寒门,是因为父亲的厚道、热心曾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或许是这种婚姻的自愿和舒心,使她甘于贫寒、乐于勤俭地为家庭倾心、倾情付出。作者描述的那段隆冬时节随母亲上山复收花生的往事,就真切地呈现出母亲含辛茹苦的人生,读罢既令人深感心酸又令人难以释怀。“记得有一日,天寒地冻,天上飘着干冷的雪花,许多人都呆在屋里热炕上闲聊,母亲还要上山复收花生”,“我边玩边看母亲劳动,风将她的头发吹得零乱飞动,母亲只腿跪地,手握抓钩不停地刨啊刨,但半天不见一个花生。”除了“勤俭持家”的深刻记忆外,作者还详写了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疼爱 and 宽容。她平日很少指使孩子“干这干那”,有时几乎达到放任的程度;她临终前担心残疾的儿子和两个幼子无人照料,恳求年仅16岁、尚未成人的女儿代行“母责”,嘱咐她以后要多照顾残疾的“三哥”和两个年幼的弟弟,她担心自己死后孩子的孤苦,要求孩子要在艰难中自强、自立,告诫他们“不能站在人家门口讨嫌”,“脚下的路靠自己走”。母亲对子女的深爱还表现在,她为让孩子不感到“死亡”的恐惧,告诉孩子无论如何也不会“吓唬”孩子,表示自己死后不会让孩子梦见自己。这份母性的温情及慈爱,让作者深感母亲的良善及美好,以至自己多年来仅有的两次梦见母亲,她都“衣裳华丽柔软、洁净美妙,一如天上的云彩”。

《母亲的光辉》偏重回顾母亲“吃苦耐劳”“勤俭持家”的美德,《与姐姐永别》则叙写了姐姐“呵护”自己的骨肉深情,她也如母亲一样“将自己所有的光热毫无保留全部奉献了出来”。《与姐姐永别》原刊于《海燕·都市美文》,问世一年多时间内,就不断被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摘》《2004年度中国散文精选》等十余家期刊转载。在王兆胜的“女性”散文写作中,这两篇作品可视为“姐妹篇”,他们都再现了母女两代身上蕴涵的“母性”力量,再现了她们含辛茹苦抚育生命的艰辛人生。姐姐名叫王淑梅,她年轻时候也像母亲一样美丽而聪慧,但因母亲早逝而不得不肩挑“呵护幼小”的母职,倾力把两个幼小的弟弟抚养成成人,即使在他们成家后还不能放下“关爱”,最终因悲伤过度而患上绝症,

年仅44岁便过早离开人世。作者在文中痛惜地写道,她的人生就像“春花的凋零”“晨雾的蒸发”“成灰的蜡烛”,令自己“仿佛五脏六腑一下子被掏空”。

在这篇散文中,作者着重叙述姐姐“呵护”自己的往事。其中,弟弟不慎受伤时她“惊恐”的表现叙述,自己高考屡次挫折时她心理难安的心理描写,自己工作后她一如往初的关爱描述,都将姐姐心底蕴涵的深厚母性一一呈现出来。作品叙述的第一件往事,便是姐姐初兼“姐姐和母亲”双重使命的一个片段。那时,她还尚未成年、缺乏照顾幼弟的人生经验,目睹小弟弟被木桩砸伤面部、血流涌出后,她便“惊恐”得“立即背起弟弟跑去找医生”。此后,这件意外小事便在她心底烙下“恐惧”的阴影,使她对弟弟的照料倍加小心、生怕再有闪失,以至达到几乎专横、无理的地步,她“不许我到村边的池塘洗澡,也不准我夜里到邻村看电影,更不让我在村中乱跑,甚至放学后或星期天我找同学玩她都不同意”。姐姐这种过于严厉的呵护,如作者所言,在自己年幼时尚无法认可及体知,但成人后方能明了她那时“多不容易”和她心中“无边的孤立无依”。姐姐这种“就像大鸟看护巢中的小鸟”的心情,在作者读中学及“高考”阶段有增无减。看到弟弟考入县里重点中学,她圆满、红润、美丽的脸庞“如花朵一样绽放”,甚至暗中为弟弟未来“考上大学做着准备”。看到弟弟连续三年高考落榜的“愁眉不展、伤心苦恼”,她既心伤、绝望又不断宽慰,甚至担心弟弟会步一些“落榜自杀”农村学子的后尘,谆谆嘱咐弟弟“千万不能做傻事”。最后一次高考,当得知弟弟能考上却不能考入理想的大学后,她却喜欢得几乎手足无措,“身体立即轻盈起来,眉开眼笑,嘴里流水似的说:‘那就行,那就行,能考上就行’”。作者工作及成家后,她虽减轻不少重负,但仍继续细心地关心“我”的生活,即使抱病卧床也不愿打扰“我”的工作。这些浸染姐弟骨肉亲情的诸多往事,使作者感到只有更好生活下去才能报答姐姐的厚恩。

从《母亲的光辉》到《与姐姐永别》,王兆胜深情叙写出母女两代女性的“母性”光辉及品质。她们身处的时代及生活虽已有所不同,但她们身为普通农村女性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却始终不变。她们都以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奉献精神操持家务、照料亲人,以坚韧、刚健的生命意志面对生

活的困难,以聪慧的心灵引导着亲人走出苦难而迈向人生的光明。在她们短暂而“光辉”的人生中,我们能看到中国农村的历史变化和难改的生存艰辛,能感到乡村普通女性身上那份深厚的仁爱力量。这些“母性”的光辉及力量,成为乡村儿女走向人生舞台的高远灯塔,成为作者“女性崇拜”思想的经验基石。

二、王兆胜的女性观与女性崇拜

在《母亲的光辉》和《与姐姐永别》中,王兆胜通过回忆性视角写出了母女两代女性身上的“母性”光辉。这种由文体、视角及叙事对象共同建构出的文学叙述,“真切”“真实”的叙事效果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叙事的意识形态“想象性”,都把女性“想象”“型塑”为只“给予”而不“索取”的“地母”形象。这种意识形态“想象性”不仅在《女性的力量》《亲近泥土》《阳光》等作品中再三呈现出来,而且升华为对女性“柔性”之德的认同及崇拜。

王兆胜“地母”观念的形成,首先缘于他个人早年的人生经验及感情体验。从劳累过度而病故的母亲身上,他感到母亲作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,其人生价值“那就是她生下六个儿女,并将自己所有的光热毫无保留全部奉献出来”^{[2]183}。从身兼“双重使命”的姐姐身上,他感到姐姐短暂的一生都是“只‘给’不‘取’”^{[2]210}。从他第一位恩师、中学物理女教师“刘老师”身上,他感受到一种如同炉火般的母性关爱和仁慈。王兆胜“地母”观念的形成,还受林语堂“女性崇拜”思想的影响。他在研究林语堂“女性崇拜”思想的论文中,指出林语堂“女性崇拜”思想主要受其母亲、二姐等的深刻影响。稍微研究林语堂“女性崇拜”和王兆胜“地母”观念之间的关联,就可看出,王兆胜《母亲的光辉》《与姐姐永别》《我的第一位恩师》等散文的写作,与林语堂关于母亲、二姐的“自述”有着一定的“互文性”。最后,王兆胜“地母”观念的形成,还受他崇尚的“道家文化”的规约。

王兆胜对女性“地母”情怀的心理经验及认识,使他面对当代“女权主义”思想潮流的思想偏颇时,自觉地将它转向对女性“柔性”之德的赞美及弘扬。他认为女性应秉承“自然”的性别角色规定、以“阴柔”之道贡献社会,并视女性“柔性”之德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主宰者,呈现出鲜明的“神化”

“崇拜”女性的思想倾向。在《女性的力量》中,他认为女性要获得权力、人格和尊严,就应遵循“家的意识”和“柔性”,就应以涵容、慈爱、温柔等来恩泽和庇护这个世界。在《亲近泥土》中,他针对现代化和城市化加速蚕食农业文明的历史趋势,指出“母亲”和“土地”永远是人类的根本和皈依,因为它们都蕴涵着“生命的真谛、自然的法则和天地的情怀”。在《阳光》中,他将“母爱”和“阳光”联系在一起,认为它们都是未经尘世污染的“自然之精华”“神圣的使者”,其中都寄寓着“无限的爱和无私的赐予”。在这些作品中,王兆胜都把女性定格在“孕育”生命的伦理方面,将女性视如大地、太阳等无私奉献的神性存在,将女性“柔性”视作“这个世界上所有生命的心灯”^{[2]230}。这种“想象”女性的思想倾向,显然诗化了女性生命“自然”神性的一面,但遮蔽了女性作为“历史性”和“社会性”存在的另一面。

王兆胜不仅神化女性的“地母”情怀和“柔性”之德,而且视他们为“天地道心”、为天地中最有力量的存在。在《母亲的光辉》中,他赞颂母亲是“我们生命的起点”“我们生长的温床”“点亮我们的蜡烛”,“是滋润我们的甘泉”,认为自己由一个农民之子能够考上大学、读到博士并有所发展,主要离不开“母亲的恩爱、品德和智慧”。在《与姐姐永别》中,他不仅视姐姐为深情的慈母,而且认为姐姐虽为农村妇女但“明理聪慧”“有胆有识”,她的“呵护、温暖和智慧”将永留在自己“心间”。在《女性的力量》中,他认为女性以柔性“黏合一切”“战胜一切”,是世上“最纯洁、最美好、最有力量的女人”,永远是“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也是最有力量的主宰者”。在《亲近泥土》中,他把朴素、卑微的大地比喻为母亲,深情地说“大地真如人之母,有着非常博大、宽厚和仁慈的情怀”,不管“我们”长到多大、走到多远,她总是“我们永恒的‘土地’,在生命和精神上,我们是不能与她割裂联系的”。在《我的第一位恩师》中,他从最“严厉”的女物理老师身上感受到母性的关爱与仁慈。当她知道“我”自母亲去世后要提早回家做饭,向来“严厉”的她不仅答应我的请求而且对我“关心备至”。文中写道:“刘老师的关爱使我触到人与人之间那天天然淳朴和温柔善良的所在,那是最美好和弥足珍贵的。同样,在自己的人生观中,我一直坚信‘关爱’和‘柔情’的力量,一直崇尚奉献和赐予的信条,一直对天地自

然的一草一木怀了感恩戴德之念”。凡此种种,无不尽显王兆胜对女性“母性”及“柔性”的崇拜之意。

王兆胜对女性“地母”的想象和女性“柔性”之德的崇拜,虽带有个人真实的经验、体验性,但也带有道家的文化观念,显示出“神化”女性的文学叙事倾向。这种文学叙事倾向彰显了女性的“自然”伦理意识,规避了女性作为社会主体、历史主体存在的现实性,旨在规劝女性“切不可忽视甚至背离女性的角色性质及其特征”^{[2]91}。在《母亲的光辉》和《与姐姐永别》等“自叙性”散文中,我们尚能看到女性的“母性”所面对的社会生活情形;但在《女性的力量》《亲近泥土》等散文中,作者已将女性的“柔性”从社会、历史等情境中剥离出来,仅以“道家”文化立场对女性进行抽象化、神化的诗性想象。

三、王兆胜“女性”文学叙述的 话语谱系与文化立场

王兆胜对女性“母性”和“柔性”的文学想象和书写,主要是针对当代城市化、现代化所带来的“文明病”和当代女权主义思想“偏误”而言的,旨在警醒女性在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不要违背“自然法则”,只有在遵循及皈依“天地之道”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天地人心和谐的状态。这种看似带有历史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,实质是他对宇宙、人生等思索之后的自觉文化选择。

在王兆胜一往情深缅怀女性“地母”情怀的叙事中,可以发现,他叙事话语所继承的并非中国近代社会兴起的“贤妻良母主义”,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历史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。维新变法时期,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维新派为推动民族“自强”运动,借鉴日本女子教育实践开启了现代女子教育,旨在造就及提高女子为民族国家培养“合格”国民的“母职”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,这种“良母主义”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仅被“男女平等”的个人主义妇女观所解构、所替代,也逐渐被新兴起的马克思主义“劳动妇女”观替代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,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,妇女解放只有在人类私有制消亡以后才可实现。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指导下,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,始终动员和组织妇女走出家庭、参与革命和社会生产,确立了“劳动妇女”话语及其历

史实践在新中国的历史主导地位。从《母亲的光辉》《与姐姐永别》《我的第一位恩师》等回忆性散文中,我们看到,王兆胜书写的乡村女性都是“劳动妇女”的实践主体,她们不仅肩负操持家务的“天职”,而且要像男性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劳动。也许是她们肩挑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角色,她们的人生才显得如此艰辛及疲惫,她们身上潜隐的母性才在“劳作”“劳累”中显得“光辉”及动人,她们因过度劳累而病故的人生令人痛惜、扼腕。换言之,王兆胜在自己母亲、姐姐身上感受到的女性刚健、坚韧等品质,都是新中国成立后“劳动妇女”话语所塑造出的女性“主体性”品质,这和赵树理小说中的“三仙姑”“小腿疼”等“好逸恶劳”型的“落后”乡村女性构成对立、互补的话语关系。我们不知道,王兆胜在写作过程中,在每次忆及母亲、姐姐病故的痛楚泪水中,在赞颂母亲、姐姐身上焕发的母性光辉时,是否能清醒地意识到他所书写的这些女性对象都属于“劳动妇女”的历史范畴?是否深入认识到她们身上美好、动人的“光辉”品质属于我国当代“劳动妇女”的道德品质?进而言之,他在为母亲、姐姐两位亲人过早离开人世而伤感时,他又是否能清醒地意识到“劳动妇女”话语实践的历史局限性?是否意识到对女性奉献、牺牲精神的礼赞即是“劳动妇女”话语的一种转喻?

如果说王兆胜“地母”的叙事话语属于“劳动妇女”的话语系统,那么其对女性“柔性”的“崇拜”则继承了中国“道家思想”的文化传统。道家不仅认为“道”为宇宙万物的本源,强调遵循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存在法则,主张“无为无不为”“柔能克刚”的生存智慧,而且把“母性”视为生育万物的“本源”而加以崇拜。“从宗教意义上说,还较少有哪一种宗教能像道家文化这样把女性、母性如此重视”^[3]。受此影响,他奉劝女性不要背离自己的性别角色,主张女性要坚守“家的意识”和涵养宽容的“柔性”^{[2]91-92}。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,崇拜女性柔性之美的男性作家恐怕仅有林语堂、孙犁等少数人,但在当代文学史上,这种崇拜及其书写也愈来愈少见。王兆胜对女性“柔性”的认同及崇拜,既是道家女性崇拜观念在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实践,又是针对当代女权主义挑战文化传统、对抗男权的善意批评。他认为当代女权主义

的重大误区之一即是对“女性”角色的抗拒,这使当代女性解放运动在对抗及否定男权的同时也走到背离、异化女性性别角色的地步。可以说,王兆胜对女性“柔性”的书写及崇拜,既不像林语堂那样向西方宣扬“东方女性”的美好,也不似孙犁那样被女性一腔柔情中的“深明大义”所感染,而是以传统的道家文化立场抵御着当代各种文化思潮对“女性”性别角色的“异化”,以使女性解放运动走向“人道”和“自然”和谐统一的正确方向。

从王兆胜叙述女性的话语谱系角度,可以看出,无论是他的“劳动妇女”话语和还是他的“道家文化”话语,都没有走出“男性中心”的话语藩篱,也跟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话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及张力。这种略显“保守”的女性观及其文化立场,却是王兆胜结合自己人生体验和学识水平所沉静

思考后的自觉选择,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种新兴的思想潮流显得有些落伍、孤单。在人类历史及文化正处于巨大变革时代的今天,我们目前还无法清晰地窥见人类历史及文化的未来图景,也根本无法用“历史实践”的最终真理去检验王兆胜“女性观”的正确性。但不论他的女性观属于思想的乌托邦冲动还是浪漫主义的历史怀想,他的“女性”散文写作都向读者呈现了一份自我真诚的情感及思考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韩晓惠.君子学者王兆胜[J].南方文坛,2006,(4).
- [2]王兆胜.天地人心[M].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6.
- [3]王兆胜.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[J].社会科学战线,1998,(1).

(责任编辑:任屹立)

参见王兆胜《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》《女性的力量》《良心担承与生命书写——读韩小蕙的散文创作》等文。